

往事如昨

追寻父辈的足迹

——成昆铁路纪行

齐儒 孙丹 撰文/供图

金秋十月，原铁道兵47团的子弟们从山东烟台、威海，陕西西安，山西阳泉汇集四川乐山，追寻父辈的足迹，重走他们用生命筑就的成昆铁路。

临行前，我陪在96岁的父亲身边，谈起成昆铁路，他沉默良久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去吧！我是在成昆线上任的副参谋长，你们在那里住了整十年。那里有说不完的故事，那段岁月苦得你们无法想象，却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年华。”

父亲的话像一把钥匙，为我打开了通往那段岁月的大门。

这条铁路，在我们心中从来不是地图上冰冷的线条。它是我们子弟的整个童年——是

二

孙家姐妹说起妹妹在峨眉出生的往事，那些坐着绿皮车颠簸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；香敏姐提起她那当汽车连连长的父亲，讲他当年在大凉山如何冒险救下驾驶员、立功受奖的故事；永康哥记忆里，是放学后总爱在那还没铺碎石的道床上奔跑的童年；蒋哥聊起他和金口河博物馆的缘分，一次又一次去专程探访。其他姐姐们则回忆起父亲下班时满身岩粉的样子，还有那个被一把抱住时硌得生疼却又温暖的拥抱，香敏姐还轻轻哼起《学习徐文科》那首歌。

汽笛长鸣，车轮飞转。成昆铁路创造了13项世界之最、18项中国之最，联合国将其与阿波罗登月、苏联首颗人造卫星并称为“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”。1096公里的钢铁巨龙，是数十万筑路者用十三年光

三

五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踏访这条属于父辈的铁路，感受父辈的艰苦卓绝与铁血荣光。博物馆里，每一件文物都在低声诉说：那把锈迹斑斑的风枪，让我们听见了隧道深处的呐喊；那张泛黄的施工图，让我们看见父辈们彻夜不眠的背影；烈士名册上永远定格在二十岁的年轻面容，让我们泪湿眼眶。

站在幽深的隧道口，山风呜咽，我们仿佛仍能听见当年风枪的嘶鸣——那声音穿透时光，从会仙桥、赵坪、丰都庙等六十二座隧道深处阵阵传来。我们听见了战士们放弃安全的水风枪、改用干风枪突击作业时那刺耳的钻击声。我们听见了塌方来临前，老兵一把推开新兵时那声嘶力竭的“快走！”肺气肿几乎成了许多老兵的职业病，那一声声咳嗽，都在诉说着当年干风枪下那些未被记载的牺牲。

九里——铁十师师部驻地，细雨中，我们望见了徐文科烈士的纪念碑，那个火热的



清晨惊醒梦乡的爆破声，是黄昏时分父亲满身石粉归来的身影，是每个夜晚望向群山时“父亲就在那里”的笃定。我们从小就知道，这条铁路是父辈们用生命换来的——隔壁王叔在大渡河边翻车摔断了腿，同学闽生的父亲永远留在了黑龙溪隧道，很多参建者的肺里都装着排不净的石粉。

10月19日晨，峨眉火车站飘着细雨，我们9名铁道兵子

弟踏上了南行的5619次绿皮车。

就在这飞鸟难越的绝境中，父辈们率领六个团及数千民工，用不到两年时间凿通135.6公里天险，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70天。

1966年寒冬，铁十师转战西昌礼米段。在那动荡的年月里，再大的困难也摧不垮这支钢铁之师。1970年7月1日，十万军民齐聚管区内的西昌车站，当两列披红挂彩的列车在礼州站胜利会师时，整个山谷沸腾了。父辈们五年的奋战，终于化作横贯西南的钢铁丰碑。

铁路修通后，父辈们征尘未洗，又奔赴襄渝铁路的新战场。而我们这些孩子，继续留在乐山基地，直到1974年父亲三上青藏线——前后整整十年。这十年间，我们听着爆破声入眠，经常看着担架队抬着伤员从门前经过，我们早早就懂得了生命的重量。

壁蜿蜒，山如刀劈，谷深千仞。就在这飞鸟难越的绝境中，父辈们率领六个团及数千民工，用不到两年时间凿通135.6公里天险，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70天。

1966年寒冬，铁十师转战西昌礼米段。在那动荡的年月里，再大的困难也摧不垮这支钢铁之师。1970年7月1日，十万军民齐聚管区内的西昌车站，当两列披红挂彩的列车在礼州站胜利会师时，整个山谷沸腾了。父辈们五年的奋战，终于化作横贯西南的钢铁丰碑。

铁路修通后，父辈们征尘未洗，又奔赴襄渝铁路的新战场。而我们这些孩子，继续留在乐山基地，直到1974年父亲三上青藏线——前后整整十年。这十年间，我们听着爆破声入眠，经常看着担架队抬着伤员从门前经过，我们早早就懂得了生命的重量。

刻想的还是怎么把隧道打通，把活儿干好……”这座建在站台上的纪念碑很特别，是全国唯一设在车站里的烈士纪念碑。

年复一年，每当新兵入伍、老兵退伍时，部队都会组织大家来这座纪念碑前宣誓、告别。一批批铁道兵从这里走过，把徐文科的精神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。

当年，父辈们用上千吨炸药，在猿猴难攀的悬崖上炸出一方站台，至今仍在诉说着四十八团官兵的誓言。

成昆铁路，早已超越了一条铁路的意义。虽然当年的筑路者大多已经长眠或老去，但在我们子弟、在更多后来人心中，它是一座永恒的丰碑。它教会我们什么是牺牲，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用生命践行诺言。踏着父辈的足迹，我们带去了所有铁道兵十师子弟的思念……

管先生饭

孙运强
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在我老家的每个自然村，不论有多少学生，都有一所小学，村里的孩子都在本村上学。但教学的公办教师，却都是外村的，即使本村有小学公办教师，也都在外地任教，这可能考虑到本村教师在本村教学会因私事分心。在那个崇尚大公无私的年代，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要背井离乡到外地工作，夫妻俩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。

村里来了教师，村干部必须安排好吃和住的问题。如果是男教师，可找一处闲房自己独住，也可在办公室的一隅搭个床铺，办公兼宿舍，一室两用。若女教师，一般找一户寡居的女人家，这样彼此是个伴，方便且安全。教师要全天上课，晚上也要备课和批改学生作业，没有时间自己做饭，这就需要村里派饭。派饭大多数人称为“管先生饭”，源于以往人们把教师尊称为“先生”，沿袭成规。

管先生饭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，每个时期户主对先生的饭菜和对先生的尊重程度也不尽相同，真可谓一言难尽。

新中国成立后至“文革”前，可以说是教师的人间四月天。那时每一户人家，无论你家有没有孩子上学，哪怕是只有一位老妪，都把管先生饭看作一件神圣而又庄重的头等大事，绝不凑合。这些长年累月与土地打交道的庄稼人，没有多大的学问，甚至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，也讲不出深奥的大道理，但那种敬重教师、尊重知识的朴素感情，却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骨子里。

村里干部为了让教师吃饭方便，特地找木匠做了一个精致的木板饭盒，大约有一尺半长一尺宽，分两层，下面放饭菜，中间放一隔板，板上面可放餐具，再上面是盒盖，饭盒的中部有提把，类似一个菜篮子，既保温又卫生。户主做好先生饭后，装入盒内，按三餐约定的时间准时送到学校，饭后再拿回家准备下一顿，一户管一天，当晚就把饭盒传给下一家。

后来人们觉得送饭耽误时间，且在冬天饭菜凉得快，为使教师吃上热乎乎的饭菜，大家改送饭为请教师直接到家吃饭。教师坐在农家的热炕头上吃饭，可利用吃饭之机与学生家长拉家常，拉近学生、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。

那年代人们过的是穷日子，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大多数人家数米而炊。即使这样，他们宁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，也不能把先生饭做得拿不出手。更要有要脸面的人家总要打听上一家给先生做的什么饭，这并非是斤斤计较怕吃亏，而是要把饭做得比上一家更好，并且不重样，先生吃起来才会有胃口。比如你今天包包子，我明天就包饺子，你包饺子，我就做过水面。

教师每在一户吃一天饭之后，按上级规定付一斤粮票三角钱。说实话，这些钱票远不够户主管饭的费用，但没有一户人家斤斤计较，还有的分文不取。

进入“文革”，教师的地位一落千丈，饥一顿饱一顿，或隔一顿吃一顿是经常的事情。那时在我村任教的是一位年事已高即将退休的黄老师，一天上午竟突然晕倒在讲台上，大家急忙把他送往医院。事后才知道黄老师早上没有吃饭，空着肚子给学生上课，加之年高体弱，便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情。

“文革”之后，国家恢复了高考，之后又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，教师的地位得以恢复。这一阶段管先生饭的时间不长，仅有四五年的光景。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了，饭菜的质量也明显好于以往。但各家各户形形色色，参差不齐，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者有之，青菜萝卜粗茶淡饭者也有之，但也有个别人家把管先生饭看得无关紧要，甚至让教师吃闭门羹。再后来，学生数量减少，各个自然村的小学全部合并，以相邻的七八个村为片，成立完全小学，所有的小学教师也全部到完全小学任教，学校设有伙房，有专业厨师做饭，“管先生饭”这一延续多年的习惯自此终结。